

道德增強：技術規訓的新形式

Moral Enhancement: A New Form of Technological Discipline

蔡 昱

Cai Yu

Abstract

The article “Can We Biotechnologically Construct a Morally Better Human?” systematically assesses the theoretical controversies, practical paths, and core dilemmas associated with moral enhancement via biotechnological means. The critique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is a core issue in reflection on Western modernity. Moral enhancement technology restricts human freedom, allows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to control and infringe on human nature, and thus serves as a new form of technological violence and technological discipline imposed on individuals for social control and to meet social needs. Such technology does not receive support from Confucianism or Taoism.

蔡 昱，雲南財經大學教授，中國昆明，郵編：650221。

Cai Yu, Professor, S Institute of Finance,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Kunming, China, 650221.

《中外醫學哲學》XXIII:2 (2025 年)：頁 165–16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3:2 (2025), pp. 165–168.

自啟蒙運動以來，技術理性在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同時，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異化與統治。技術理性批判是對西方現代性反思的核心議題。

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認為，啟蒙在工具理性中揭示了自然運作的秘密，但此過程中，也逐漸釋放了一種統治驅動力，並反過來作用於人，由此顛覆了啟蒙的解放承諾。在此過程中，人類付出了對自己本性的統治和社會控制的代價；瑪律庫塞的分析則聚焦於發達工業社會的極權主義特徵。他認為在面對這個極權主義特徵時，傳統的技術中立性的認知不再成立——技術本身不能與它被使用的方式相分離。當技術服務於建立新的、更有效和更愉快的社會控制和社會凝聚形式時，技術便是統治系統；哈貝馬斯揭示了技術理性對交往理性的殖民化。進而，在技術領域接管交往領域後，技術和科學的“意識形態”便掩蓋了交往理性領域的自主性；海德格爾對技術的思考代表了技術哲學的一次根本性轉向，即從認識論和社會學視角轉向存在論視角。他認為現代技術的顯著特徵是暴力。暴力的本質在於它不僅是損害，而還是侵犯，即對本質的傷害。顯然，當人們僅僅被作為人力資源，而非作為一個人而被對待時，就被侵犯了；福柯分析了規訓技術和規範性社會科學的相互作用，及其作用下的作為馴順而沉默身體的個體。他的權力技術分析揭示了技術如何與權力相互構成。在他那裡，規訓權力涉及分析和重新安排人口，以“產生力量”。顯然，“產生力量”必然需要監督、糾正和培訓；鮑德里亞則揭示：作為消費社會的富裕社會也是將失範納入其消費代碼和結構的社會。暴力不再是失範，疲勞不再是異常的狀態，相反，它們成為預先構建的消費代碼的一部分。

埃伯爾與阿吉博拉的《我們能通過生物技術構建道德更為完善的人類嗎？》一文，系統梳理了以生物技術手段，如藥物干預、神經刺激或基因干預等進行道德增強的理論爭議、實踐路徑與核心困境。我們發現，道德增強技術完全符合前述思想家對技術統

治的描述，它是技術對人規訓的升級形式。具體而言，第一，如文中指出，道德的價值不僅在於行為的善，更在於選擇的自由，而道德增強的生物技術使道德行為淪為被動的生理反應。也就是說，技術手段進行的道德增強限制了個體的道德自由，削弱了個體真實行動的能力。顯然，道德增強技術對人之自由的妨礙、干擾甚至剝奪也就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所說的工具理性對人之本性的統治。同時，這種對人之本質的侵犯也符合海德格爾所說的技術暴力的特徵；第二，道德生物增強的應用被認為具有緩解與核武器、生化武器等人類生存風險相關聯的緊迫性。也就是說，道德增強技術被應用於建立新的更有效和更愉快的社會控制和社會凝聚形式，即瑪律庫塞所說的技術社會的集權主義特徵；第三，道德問題本就是哈貝馬斯所討論的交往理性問題。道德增強技術的應用是典型的技術理性對交往理性的滲透，掩蓋了交往理性領域的自主性；第四，道德增強技術符合福柯所說的規訓的特徵，即重新安排人口以產生力量，當然，其本質是監督和糾正個體而服務於社會的需要；第五，根據鮑德里亞的學說，在西方現代性和消費社會的條件下，道德增強也將成為消費而被納入資本邏輯和資本增值的體系中，進而發生異化，甚至成為強制要求。

與此同時，道德增強技術也難以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支援。簡言之，在儒家看來，道德不是簡單的可被技術調控的生理反應，而是人先天具備的“四端”之心的擴充與完善。這種心性本善的預設決定了道德的本質是“喚醒”本有的道德稟賦，而不是植入和控制，也即它強調的是一種內在超越性，而不是工具性；老子認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真正的道德並非刻意的服從規範與約束，而是順應自然本性的行為流露。這裡同樣沒有“編輯”道德的餘地。顯然，道德增強背離了道德的自然本性，破壞了道德的本真狀態。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埃伯爾·阿吉博拉：〈我們能通過生物技術構建道德更為完善的人類嗎？〉，
《中外醫學哲學》，2025年，第23卷，第2期：頁85-113。Eberl,
Jason T. and Matilda Ajibola. 2025. “Can We Biotechnologically
Construct a Morally Better Hum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3(2): 85-113.